



刘增钰

## 日本鬼子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好打

讲述人刘增钰

刘增钰,1918年8月3日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尚镇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。父亲在山西开有好几家“德聚堂”药店,家中经济富裕。早年他从镇小学毕业后考入太原成城中学,初中毕业又考入孔祥熙创办的美国教会学校太谷铭贤学堂。1937年6月专科毕业,由于品学兼优,英语满分,被孔祥熙圈定保送到燕京大学。到达北平之后,他临时决定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。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,整个北平一片混乱,所有学校停止招生,他在炮火中离开北平,回到太谷投笔从戎,被编入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,领到一支仿造并已用旧的三八式步枪,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涯。

年近百岁的刘增钰身板硬朗,记忆清晰,有一股军人和文化人特有的气质。他说:“当时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,刘伯承是师长,邓小平是政委,秦基伟是我们的支队长。那时这些人都还不出名,整天带着我们在山里打游击,打游击一般都是偷袭,不和日本鬼子正面对着干,打一下赶紧就跑。跟着部队连打带跑,一个月后就当了班长,第二个月就当排长,第三个月就被破格提升为连长。所以当连长主要是因为我把死了一个抓鸡的日本鬼子。大概是1937年10月的一天,我们排埋伏在太谷县北冶头村的一个山梁上,老远就发现村口进来5个日本鬼子。我分析,他们不是来抓鸡抢东西,就是来找小姑娘,因为不远处就是日本鬼子的回马机场,机场的鬼子经常出来骚扰掠夺老百姓。等他们快到我们跟前的时候,我瞄准领头的鬼子,一枪就把他给撂倒了,其他几个吓得扭头就跑,我们还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儿,这是我打死的第一个日本鬼子,当连长就是因为这件事。”

193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,刘增钰带领全连战士正在和顺县义兴镇团壁村休整,没想到汉奸向日军告了密,结果十几个鬼子带着近百名伪军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突然对团壁村进行清剿。刘增钰说:“那天晚上先是和鬼子枪战,最后打来打去我们没子弹了,就开始拼刺刀,有个鬼子冲上来第一刀就把我身上背的面袋子划破了,满院子撒的都是面粉。乱打一通之后,我们只打死一两个鬼子和几个伪军,我一看打不过他们,命令大家赶紧撤,好在乘乘天黑路熟,我们撤了出来。不久我又被提升为营长。”

我问当年是否真有拼刺刀的事情,他说:“当然有,只不过拼刺刀日军的技术要比我们高,他们每一刀都有讲究,也能刺到要害。如果硬拼,我们根本拼不过他们。当年我们在关家窑战斗中,两三个人拼不过一个日本鬼子,因为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学生出身,他们当时全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,也是很有作战经验的老鬼子,而不是1944年和1945年期间补充上来的小鬼子。日本鬼子拼刺刀,为了防止在混战中误伤自己人,一般都不开枪,他们拼刺刀都是反刺,反刺主要是侧身避开对方的枪向前突刺,架势虽然不好看,动作也简单,但实战很管用。当时我们部队有一些国民党29军和平汉纵队过来的老兵,教我们一些花刺和耍大刀片子的功夫,他们教的花刺,就像现在的武术和气功,爱摆花架子,架势很好看,但只适合操练和表演,在战场上不管用,也很容易被对方刺到。后来我们抓了日本俘虏,跟他们学反刺,刺杀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。”

我问他抗战中还参加过哪些战役战斗。他说:“抗战的时候,我除了在榆次、太谷、寿阳、平定打过一些小仗,还

打过反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的大仗。百团大战的正太路破击战、寿阳伏击战、榆辽战役、关家窑战斗我都参加了。1940年8月,我在129师新10旅旅部参加百团大战,冒雨连夜攻打正太线上的赛鱼车站。瞎打了一夜,也不知道敌人在哪儿,天亮以后七八个日军以为我们跑了,出来准备追我们,我立即指挥部队开始围攻,很快就消灭了那几个鬼子,最后攻占了车站,破坏了铁路。百团大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家窑战斗,我们129师的385旅、386旅、新10旅和决死队两万多人参加了战斗,鬼子虽然只有500多人,但很顽强,那次打得非常残酷。撤退回来我们10旅剩下不到一半人。”

他说:“日本鬼子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么好打。那时打仗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,有打仗,有胜仗,更多的还是败仗。记得1942年的一天,在沙河县柴关反扫荡,我们10旅旅长范子侠在阵地上指挥战斗,当时他还拿个望远镜一边看,一边说话,突然就倒在地上,是远处飞来一发子弹,正好打在了他的胸部,一句话都没说就阵亡了。我打了十几年仗,受过好几次伤,最重的一次是在1938年的反九路围攻战役中,日本鬼子在我左腿上穿了一个洞,当时动都动不了,住了40多天院才能下床,从此我就成了三等残疾,享受每月一只鸡的待遇。其实那时我们天天吃小米,哪能吃到鸡,这个待遇只是个名义。”

在山西至今还流传着“刘营长赤脚进张净”的故事,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刘增钰,大概内容是百团大战的时候,刘增钰赤脚带兵打下张净车站的情景。我问他是否有这回事。他说:“没有,那只是一种宣传,其实我打的是赛鱼车站。那次我们跑到张净车站的时候,别的部队已经把张净车站的日本鬼子打完了,有的被打死了,有的逃跑了,我们只是接收了张净车站。后来可能是要宣传,也不知道谁打的,当时宣传人员找我问情况,我正好进城买鞋刚回来,因为下雨打仗我鞋弄湿了,结果他们就用学手法给加工了一下,说我打了张净车站,后来这个故事就流开了。”我问他是否还参与消灭过日军的一个运输大队。他说:“没有。只是有一次我们在平定西边的一条小路上埋了几个地雷,结果炸死日本鬼子运输队的一匹马,马肚子上炸开个窟窿,马上的人没死跑掉了,这事宣传得也不对。”

我们最后说到日军在山西的屠杀和暴行。他说:“日本鬼子真是太坏了,当年我家房子又多又好,都是用木头盖的,1942年5月日本鬼子扫荡太行山,把我家也给烧掉了。还有在距我老家十几里路的地方,有个村庄叫广阳,八路军有名的广阳战斗就是在那儿打的。仗打完之后,日军为了报复,兽性大发,把村里男女老幼全部赶到村头一片空地,说要给大家照集体相,照相机架好了,用一块黑布盖着,等鬼子把村民集合起来排好掀开黑布的时候,下面盖的竟然是一挺机关枪,不到5分钟,全村老百姓都被打死了。我当时虽然没在现场,但可以想象有多么惨烈,所以我们那里的老百姓特别恨日本鬼子。”

1945年日军投降后,刘增钰先后在太行军区、晋冀鲁豫野战军、第二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,并且参加过豫西伏牛山战役、洛阳战役、郑州战役和淮海战役。

1949年8月,刘增钰从昆明调到北京,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。1949年11月11日空军部队正式成立的时候,刘亚楼是第一任司令,吴法宪是第一任政治部主任,刘增钰是第一任文化部长。他先后创办《空军文艺》,创作长篇小说《风雪太原城》,为空军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。1950年他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代

## 老兵讲抗战

黑明

100个知青,100个农民,100个在天安门前照过相的人……摄影家黑明一直关注在大历史中个体命运的沉浮,用镜头和文字共同呈现“一个人”的历史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,黑明创作了“100个人的战争”系列,今选发其中片段,以表达我们对所有抗战老兵的敬意。

表大会,先后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。1958年调入总参,一直在解放军某部担任军职政治委员,1984年离休。

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,反正省下的钱是国家的

讲述人王淑清

王淑清,女,1911年7月10日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何桥镇一个大户人家。清末时期她家出一个文状元,一个武状元,她却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



王淑清

观念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。19岁那年,父亲做主将她嫁给了沛县比他大两岁的刘家康。刘家康的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名处长,刘家康在天津随日本传教士学了一手精湛的医术,1930年回到徐州开办诊所。婚后王淑清在丈夫的熏陶下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,在诊所帮助丈夫消毒、换药、打针。1931年刘家康的诊所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,从此王淑清也跟着丈夫参加了革命。

1937年春,几名国民党警察突然闯进诊所将刘家康抓走,王淑清问为什么抓人,警察只说了一句:“嫌疑!”当时她并不理解嫌疑是什么意思。刘家康被关入国民党徐州监狱之后被打得死去活来,数月后抗战爆发,由于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,春节期间他被释放回家,随后他带着王淑清离开徐州回到沛县开办诊所。1938年3月徐州会战打响,沛县也落入日军手中,刘家康只好带着王淑清又回到老家魏庙镇房村,不久他在镇上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团。1939年初,他在微山县城碰到狱友张新华,此刻的张新华已经成为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,他问刘家康愿不愿意参加游击队,希望他留下为伤员疗伤,两人一拍即合,刘家康很快便带着王淑清以及家中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物,一起去了微山县参加游击队,并在夏镇三孔桥村建立诊所,为受伤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疗伤。

1939年夏天,根据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,由张新华组织配合,并在山东枣庄火车站旁的陈庄开办炭场,发展地下武装。1940年1月在炭场成立枣庄铁道队,不久被苏鲁支队正式命名为鲁南区铁道大队,任命洪振海为铁道大队大队长,杜季伟为政委,王志胜为副大队长,开始在津浦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。王淑清说:“铁道大队成立

后,整天偷偷摸摸去和日本鬼子干仗,有一天他们跳进日本人的正泰洋行杀了十几个鬼子,自己也伤了好几个,跑回来我们挨个给包扎,有些伤得很厉害。打劫洋行成功以后,他们又想办法打劫火车,受伤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在当地也越来越有名,有人叫铁道大队是铁道游击队,也有人叫飞虎队,日本鬼子都感到我们这伙人很头疼。1940年3月,鬼子加强了对八路军游击队的打击,我们只好带着30多个伤员转移到了微山湖芦苇荡里面,几条小木船成了我们的诊所。那次我们在芦苇荡一直躲到割麦子的时候才出来,出来之后因为游击队的叛徒朱广告密我俩参加了八路,刘家康的父亲和二叔都被铜山保安团长耿继勋砍去给杀了。”

194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吸毒成瘾的沙沟火车站站长张永纪为了得到好处,突然跑到诊所告诉王淑清和刘家康,当晚会有一列日军送药物的火车从沙沟站经过。他俩得知消息后,迅速

员缴枪投降,随后铁道大队奉命赶到滕县接受改编编入华东野战军,王淑清和刘家康分别被安排到华东军区第14医院和鲁南第二专署工作。1949年部队南下前夕,为了支持地方工作,这对从战火中走来的夫妻被军安安排到地方,让他们留在曲阜帮助地方政府创办曲阜卫生院,1950年组织又委托他们建立曲阜县人民医院,刘家康成为第一任院长,王淑清成为第一任护士长。

王淑清说:“那时候铁道大队的游击队员,大部分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,很多还没长大。他们和鬼子干仗吃了不少苦,流了不少血,每次受伤都是我刘家康给包扎、治疗。他们除了打鬼子,从不欺负老百姓,但在‘文革’的时候,有人说铁道游击队的人是土匪、流氓,有人说他们是叛徒、汉奸,不光批

嘱咐,一边流泪,他给母亲敬了一个军礼,再也没有回头。

1938年8月21日,吴淞随部队从长沙出发前往贵州都匀,然后又去独山受训,当时税警总团的装备和人员素质是国民党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,第二年他便从下士副班长直接升为上士排附。1941年初,他从炮校准尉副尉升为少尉干事,随后成为税警总团团长孙立人身边的一名团附。他说:“我去当孙立人的随从副官,不少人都很羡慕,觉得给他当副官能坐车,不走路,伙食也好,但我去后时间不长,就提出想去军校学习的想法,孙立人大同意了。1941年9月我离开独山,被孙立人将军保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区第18期南岳军官训练团受训,1943年毕业后,按说应该回原部队,但税警总团已经改编



释来空

斗他们,还动手打他们,让他们受了不少冤屈,包括我和刘家康也受了不少气。其实这些人我最了解,那时候他们经常住我家,不光要给他们换药、疗伤,还要给他们做饭,有的伤员不能动手吃饭,我还得给他们喂饭。”

我问她在“文革”中还经历过什么遭遇。她说:“先是1956年审干,有人说刘家康坐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,肯定是叛徒,整了好几个月,如果他是叛徒的话,那不是早就可以放出来吗?为什么还被日本鬼子关押到他们投降才跑出来?1957年‘反右’,有人又在他写的一首诗里找到‘朝里有人好做官’一句话,结果他又被打成右派派挨批斗,1958年‘打老虎’差点把他整死,他好几次在我面前哭,说想自杀。我说你什么都没见过,日本人的监狱你坐过,国民党的监狱你也坐过,辣椒水也给你灌过,大红子也压过,电椅子也坐过,现在的批斗和挨打,肯定都是暂时的,共产党早晚会把你的事情搞清楚。我一边开导他,一边跟踪他,当时特别害怕他想不开去自杀。因为我们那时有10个孩子,5个儿子,5个女儿,当时孩子考上大学不让上,脸上兵不让当,都在家没事干,他万一自杀,那我们一家人就彻底完了。”

最后我问王淑清对现在的社会和生活是否满意。她说:“还不错,我现在一个月的离休费是7000多块钱,是按抗战参加革命开始算,本来刘家康是1937年以前参加的地下党,应该按老红军算,我也是1939年就参加了游击队,结果他们说那时候没有档案不给算,只给我们按1940年算军龄和工龄,所以工资就没上去。1963年我就退休了,1982年国家给我改成了离休。现在刘家康已经去世,我也103岁了,吃饭穿衣的花费也不大,所以不管他们按哪年算,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,反正省下的钱也是为了国家。”在我看来,王淑清这代人也是国家,虽然受了不少苦,流了不少血,甚至受了不少屈辱,但相比年轻一代,他们把国家看得更重,始终把国家排在第一位。

### 我来这里出家就是为了给死去的弟兄们守灵

讲述人释来空

释来空,原名吴淞,1922年12月5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化龙池普通店员家庭。1938年8月16日,国民革命军税警总团在长沙街头征兵,他在一个征兵点的标语上看到,有钱出钱,没钱出力,共赴国难。作为一名在校的初中生和家中唯一的儿子,未经父母同意,他就报名参了军。当他穿着军装回家的时候,邻居们有人佩服,有人说他当兵去吃苦太可惜,但他的母亲却没有表态,也没有给他泼冷水,只是当天晚上一夜没睡。第二天早饭后,母亲把他送到街口,含着眼泪嘱咐他照顾好自己,多来信,千万不要狂妄自大,母亲一边

为新38师,孙立人带着他们去缅甸了,我只好服从分配,去了9战区10军3师9团3营当了中尉参谋。到了部队打的第一仗就是1943年11月1日的常德会战,会战前我们从衡阳出发,走了四天三夜,驻守在常德,没几天日本鬼子的10万兵力就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常德,很快常德就成为一片火海。74军57师余程万的8000守军只剩了100多人,每条街道都在巷战和肉搏战。我们在常德也是炮火连天,连续不断向鬼子扫射,到处躺着牺牲的官兵,眼看着常德城就要沦陷,好在蒋介石最后还是调来大部队增援,才给常德会战解了围。”

常德会战1943年12月7日结束后,吴淞又参加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等诸多战斗。抗战胜利后,他在南昌和一名护士结婚,随后部队调往贵州,他成为保安九团少校团附兼参谋主任。不久内战开始,他所在的国民党军在大别山与刘邓大军作战。他说:“并不像电影上演的我们就那么坏,演我们走到哪里都抢粮、抢鸡、抢猪,而且一脚踢开老百姓的门,拿起机枪叭叭就扫射,我们又不是土匪。再说那时候子弹那么重要,打日本人都不够用,谁还舍得打自己人浪费子弹。如果当时有这种事情发生,不要说当兵的,你就是师长,也会被枪毙,有些电影完全是捏造事实,不尊重历史。”

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,吴淞为了照顾父母,不仅没去台湾,而且离职回长沙,他本想贷款做小本生意,但由于他的身份每次填表办护照,总是石沉大海。1949年底,他去香港谋求发展,后因放不下父母重返长沙,并在湖南省工业厅谋得一职。解放后,“清匪反霸”“三反”“三反”“五反”等各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,每次他都会被当作“运动员”。1959年,他突然被抓,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。直到1982年出狱。入狱后,吴淞一直在私企打工谋生。1995年他求授五戒,成为一名居士,1998年在常德石门夹山寺剃度出家,师父向他赐得法名释来空,2005年当他得知德山乾明寺得到修缮重启香火之际,立即来到当年驻守的德山并且常住在了乾明寺。他说:“我来这里出家就是为了给死去的弟兄们守灵,希望在那场战斗中死去的弟兄朝夕相伴,每天为他们念大悲咒。”刚来的那几年,他每天早晚都要去大殿堂念49遍大悲咒,现在人老了,念久了心跳气喘,于是每天改念7遍,虽然念得少了,但他超度亡灵的诚意并没有变。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

